

探索風險社會下的反身性知識技能： 以日本 311 災難報導經驗和專業反思為例

張春炎、劉昌德

本文以日本 311 震災為經，並採取風險社會概念為緯，探討新聞工作者如何因應災難報導過程的勞動風險及善盡新聞專業。透過對實際參與採訪報導的臺灣新聞工作者之訪談，本研究發現，新聞工作者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災難事件，傳統新聞採訪的專業規範往往無法發揮應有功能。本研究歸納災難新聞勞動與經驗，提出因應風險的行動參考架構，以協助新聞工作者運用於災難事件報導中。本研究結論並建議媒體單位與工作者持續以動態過程，反身性地對此參考架構進行反思，期使未來災難事件中，記者能保護自身及同僚的身心安全、更善盡報導責任。

關鍵詞：新聞生產與勞動、新聞倫理、記者安全、風險社會、災難新聞報導

張春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Email: cychang@mail.ncnu.edu.tw)

劉昌德：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Email: chadliu@nccu.edu.tw)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 25 期，頁 63-118，2017 年 10 月出版。

投稿日期：2016 年 10 月 06 日。

接受日期：2017 年 04 月 02 日。

Disaster Reporting in Risk Society: A Study of the Risk Experiences and Reflexive Professionalism of Journalists Who Reported on the 3/11 disasters in Japan

Chun-Yen Chang
Chang-De Liu

Journalists' safety is a crucial issue to which researchers as well as practitione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hu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how journalists who reported on the 3/11 disasters in Japan dealt with the physical dangers and emotional stresses. Using case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first we explore 11 Taiwanese journalists' experiences of disaster reporting, and then we examine concepts of journalism safety in disaster situations. Finally, we propose a safety and ethics guide for disaster journalists and also mak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news organizations can improve journalists' safety and conclude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disaster journalism.

Keywords: news production and labor, news ethics, safety of journalists, risk society, disaster reporting

Chun-Yen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Email: wilee@mx.nthu.edu.tw)

Chang-De Li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chadliu@nccu.edu.tw)

Taiwanese Journal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umber 25 (Oct. 2017), pp.63-118.

Received: 2016.10.06; Accepted: 2017.04.02

壹、前言

日本東北地區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芮氏規模九的強震、並引發大規模海嘯，造成宮城、岩手、福島、茨城等四縣大規模傷亡，累計 15840 人死亡、3607 人失蹤、5951 人受傷，官方統計財物損失更高達 16 兆 9 千億日圓。強震與海嘯造成福島核電廠部分機組爆炸，引發輻射汙染全球擴散問題，形成罕見的複合式災難（徐淑惠、蘇崇豪，2011；松岡東香、木下知己，2012）。這場災害吸引全球媒體投入大批人力與物力採訪報導，新聞工作者也從中發現許多過去不曾面對的新聞倫理與勞動問題。

災難報導在新聞媒體中，一直是一個重要課題。Hansen（1991）指出，媒體是社會認識災難的一個重要窗口，大眾媒體更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過去有關災難與傳播的研究，焦點經常關注於如何報導災難，例如美國災難社會學者 Enrico Quarantelli 在 1985 年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創立的災難研究中心（Disaster Research Center）的諸多成果，便揭露了媒體再現災難迷思的問題。相關研究也探討了媒體如何報導災難、在採訪報導過程中如何運作，並將之作為認識與治理災難的依據（Wenger and Friedman, 1986；Quarantelli, 1996；張宜君、林宗弘，2012：194）。

過去本地災難與媒體研究的焦點，多半集中在報導內容如何抵觸新聞專業倫理，研究者亦傾向採取災難管理的角度，關切新聞報導是否抵觸違反災難管控的相關原則（臧國仁、鍾蔚文，2000）。諸如過去 921 大地震或八八風災等重大災難，不少媒體不僅發生報導不正確、報導內容誇大聳動的問題，甚至有記者在災難現場影響救災等情事，此外採訪偏差的災難新聞內容，容易混淆受災者對災難的認識，亦不利於災難記憶、知識的累積（蘇蘅，2000；孫曼蘋，2000；陳憶寧，2003；林照真，2009）。晚

近有研究則進一步探討不當的災難新聞內容，造成災民的二度傷害等倫理問題（許瓊文，2009）、建構不利災難管理的災難訊息（張春炎、楊樺、葉欣誠，2015），以及對受難者予以刻板印象化、他者化（張春炎，2013）。

311 日本震災爆發後，臺灣媒體對此事件進行大量的採訪報導，卻引發了當時社會大眾、新聞工作者、以及傳播學界的關切及批評。例如在災難發生的第四天，國內傳播學者許瓊文（2011）指出國內相關報導最顯著的問題包括使用配樂引起閱聽眾情緒反應、剪輯各式可怕海嘯來襲畫面傳遞恐怖氛圍等。

不過，本地研究多傾向「結果論」，也就是從媒體產製後的文本來探討其影響，而較缺乏前端新聞產製與勞動的分析觀點。當重大災難爆發時，許多記者奉命第一時間投入現場，在產製新聞的勞動過程中置身於危險境地中。究竟記者在新聞工作的勞動過程，如何面對與處理自身及同僚的身心安危，同時能夠兼顧新聞專業倫理並善盡公共服務責任，成為近期新聞學研究和實務上的重要議題（Sykes and Green, 2003；Tait, 2007；Cottle, 2009；Bennett, Cameron, Brent Edwards, Michael Field, David Robie, Alan Samson and Jon Stephenson, 2012；Buchanan and Keats, 2011；林照真，2009）。

本文以 2011 年在日本發生的 311 複合式大型災難為例，探討新聞工作者如何在充滿不確定的現場中從事災難新聞工作？又有什麼樣的行動策略參考框架，以面對風險狀況、增進風險處理能力？當傳統新聞採訪的專業規範無法發揮應有功能時，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災難事件，新聞工作者應該如何透過災難情境因應經驗和事後的反省，由下而上地累積更多災難新聞專業知識與行動策略？本文認為，記者在災難新聞的勞動，可視為新聞專業技術和知識的施展，藉此研究更得以重新檢視，傳統新聞專業知識與

制度在面對風險情境時，發生的種種問題及不足。作為初探性研究，本文立基於風險社會概念的指引，將歸納與分析新聞工作者的災難新聞勞動經驗，進一步提供因應災難報導工作的具體行動策略，以作為記者面對災難採訪報導的參考框架。

貳、新聞勞動與倫理規範： 朝向風險社會的研究觀點

一、新聞常規理論的技術與知識盲點

1970 年代傳播學者開始關注新聞作為專門職業，所具備的勞動實踐意義、新聞如何被妥當產製等議題，興起所謂常規理論的研究。常規理論相關研究指出，常規化的新聞生產是一種實現傳統新聞專業倫理的具體操作原則、程序，新聞業以此向社會宣稱新聞業的專業地位、建立新聞工作的正當性並且建立新聞工作者產製新聞的標準。Birkhead（1986）便將之看作是現代新聞專業倫理規範的制度化。

另一方面，常規理論將新聞工作者的工作視為——必須遵循著新聞媒體組織內所建立的常規進行新聞產製，從事有效率、品質統一的新聞生產，例如要求記者採取類似的事件分類模式，製作出符合組織標準的新聞內容（Tuchman, 1978；Berkowitz, 1992）。從職業能力養成的角度，則常規內含了新聞勞動者進入新聞這一行，所必要具備職業能力的訓練（羅彥傑、劉嘉薇、葉長城，2010）。從組織內部來看，按部就班的新聞生產，也幫助記者降低跟新聞室之間的衝突矛盾（張文強，2002；Dickinson, 2007: 191-192）。

易言之，在日常狀態中，新聞是一種循規蹈矩的媒體產物，而新聞的勞動則是一種按部就班的職業工作，包含著一連串固定的工作程序、職業傳統、角色設定、行事策略、組織形式以及技術。這些具體的新聞勞動同時體現出新聞專業需要有的信念、典範、職業信條（code）。新聞常規作為一種一般性的假設或者預期，定義了在產製過程中的各環節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角色、應盡的義務，因此當個別記者需要面對各種不同的工作處境，包括聚焦在事件、接觸消息來源、建立事實、從各種線索中發現新聞、完成新聞報導（Ryfe, 2006）。

有一些學者採取新聞常規研究的觀點，認為面對非例行的災難事件，常規化的新聞產製仍能發揮作用。如 Tuchman（1973）早期的研究，肯定常規化同樣有助於新聞工作者處理災難事件，方法是透過災難事件發生的屬性分類，回歸到既有的採訪路線來進行採訪報導，也能夠依照災難的肇因來分類，藉此來管理和控制新聞工作。Ewart（2002）研究指出，在災難報導發生時的緊急時刻，強調例行化產製的新聞實踐能夠運作來維持新聞的品質、避免流程中出現錯誤的報導行為。過去研究指出，常規不僅是一種新聞產製的程序，對於記者而言，常規過程的分工更涉及到各種新聞產製需要的知識技能的學習和實踐。此外，常規亦能夠讓記者因應災難情境以為成報導工作。

然而 Berrington and Jemphrey（2003）兩位研究者認為災難報導是一種例外的情境，這意味新聞的常規不再適用於充滿不確定性和危急的情境。特別是記者投入災難報導時，常常是缺乏適當準備，習以為常的專業技能和採訪方式也不能有效協助其順利而完成災難新聞工作。Quarantelli（2002）研究則發現，美國許多新聞媒體少有報導災難的準備計畫與記者訓練。研究卡崔娜風災

(Hurricane Katrina) 的報導問題，Tierney and Kuligowski (2006) 研究便發現，由於缺乏災難相關的專業知識，導致記者難以實現新聞專業。

另一些經驗研究發現，記者在高風險場所必須面對的安危問題，是影響災難新聞產製品質的因素。諸如 Richards (2007) 的經驗研究指出，不論是否具有經驗，不論主跑什麼路線，許多記者在災難來臨時，往往會被新聞室指派到現場進行報導工作，因此出現記者必須暴露於危險場所，卻又沒有能力面對危險，人身安全只能憑運氣。Duhe' (2008) 歸納相關研究亦發現，當災難來襲時，投入現場報導工作的記者，往往少有記者或媒體準備好進行災難報導工作，不論是災難報導所需要的知識訓練、人力或者是所需具備的工具均不足，因此缺乏洽當的應變能力及必要工具，以致於不能夠妥善進行災區採訪報導工作，甚至使自己受傷。更有媒體因為組織經費和人力短缺，僅能派遣人力不足的採訪團隊，以致於使災區採訪，使得新聞工作者不免落入面對風險的工作壓力和恐慌情緒 (Duhe', 2008: 115)。

歸納上述研究，正說明了新聞常規研究觀點，傾向於關注新聞常規的制度功能，並認為在常規的服膺過程將有助於記者獲得必要的專業技能。然而這樣的看法，卻忽視了新聞常規制度所體現的工具理性。所謂工具理性正是指方法和程序具有可計算性，並且強調任何組織只要具備工具理性的形式、程序 (張苙雲, 1992)。反思可計算性的知識系統的建立，卻又是建立在一般性新聞工作情境度，對於非常態或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挑戰，恐缺乏有效的專業技能來支應。最後，新聞常規蘊含著記者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訓練過程，但這個過程體現的是一種 Cottle (2003) 所謂的組織功能主義傾向，也就是知識訓練和能力培養多是從組織的需

求或是實現新聞品質、產製效率的專業規範著眼。然而對於個體如何因應不同風險情境，保護自身安全並完成新聞工作的知識能力討論，卻缺乏足夠關注。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災難新聞產製過程中特別需重視的「記者安全（safety of journalists）」，直到 1990 年代以後才逐漸被納入新聞專業、倫理及職能的討論。而隨著風險情境的日漸多元，例如在 311 這類前所未有的大型災難、複合性風險的災難採訪經歷中，記者如何兼顧自我安全以及實踐新聞報導的職責，則成為發展災難新聞專業與記者安全的重要案例。

二、記者安全倡議及多元風險下的記者安全知識課題

記者安全論述的發展，是晚近將記者安全納入新聞專業的重要論述。作為新聞專業以及職業倫理的一環，記者安全算是發展較晚的概念，源自於 1990 年代以來的一系列國際性倡議與推展。在這個倡議推展過程中，如何增進記者安全？持續成為國際媒體機構和新聞團體重視的議題，此外各機構也主張將記者安全提升到專業價值層次，作為專業信條以及新聞工作守則。諸如國際記者協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以下簡稱 IFJ）及其他國際組織開始推動一系列的記者安全訓練、論述與概念推廣活動。檢視記者安全倡議有一個核心論點是，記者安全是新聞專業的重要構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認為維護記者安全是保障新聞自由的一環。¹

¹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促進傳播發展的國際計畫（IPDC）的系列討論中，將記者安全列為新聞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的保障。新聞自由是聯合國人權宣言第 19 條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的一環，目的是保障各類公民有權享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之外，同時也應享有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由此脈絡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記者安全的主張，正是強調記者安全獲得保障，公眾就更容易獲得具品質的資訊，並且能促成許多的目標，包括民主治理、社會正義與人權的文化等等。相關內容可詳見 IPDC（2012），網路連結 <https://www.fes.de/themen/menschenrechtspreis/pdf/mrp2012/IPDC.pdf>。

關於記者安全的發展，根據 Tait (2007) 研究指出，源於 1990 年代世界各國記者的死亡人數增加，使得西方媒體組織開始注意到記者安全問題。然而當時普遍傾向將之視為是一種遺憾但卻難以避免的事，不論是因為戰地採訪工作或者基於調查報導、揭露不法、犯罪事實而導致的記者面臨死亡、失蹤或各種形式的暴力的事件。直到 2000 年，發生兩位知名的戰地記者 Kurt Schork 及 Miguel Gil Moreno 被殺害，才促使國際新聞組織正視記者安全的問題。當年在各類討論新聞專業的國際論壇中，記者安全成為重要的探討議題。許多媒體組織更共同建立以關注記者安全為宗旨的聯合組織——新聞安全協會 (News Security Group)，成員主要為英、北美、澳洲為主的大型電視新聞媒體。新聞安全協會成立大會當時所發表新聞從業人員的安全信條，更成為日後推動記者安全倡議的基本論述。該信條主張各媒體應該朝安全信條內容所陳述的理想邁進，將記者安全的維護列為首要目標，而不是持續採用過去以新聞價值為優先的態度。同時該組織成立時所發表的安全信條內容，內容更奠定了日後有關媒體組織與個人如何認知和實踐記者安全的原則，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七點 (Tait, 2007: 439-440)：

1. 安全是最高原則；
2. 危險的任務指派必須是出於自願的；
3. 在追求新聞報導過程中，未受到危險警告是不能接受的；
4. 記者可以要求雇主提供適合的訓練；
5. 為所有在危險區域工作者的新聞從業人員進行保險；
6. 媒體組織應該鼓勵從危險區域報導工作回來的新聞從業人員，多利用新聞組織所提供的心理諮詢服務；

7. 建議媒體組織應該一起合作，建立安全資訊的資料庫，並且彼此交換最新的安全評估資訊；

作為國際最大的記者組織，IFJ自1926年創立以來，便關注新聞從業人員的勞動人權。從關注記者被傷害的問題出發，1990年代IFJ進一步深化勞動議題，開始關心記者的採訪安全問題。1992年IFJ成立安全基金（Safety Fund），²以此支持安全受到威脅的記者，提供其緊急的國際援助。以安全基金為基礎，IFJ更有系統地推動一系列記者安全計畫，包括出版專書、IFJ年度安全報告（IFJ Safety Manual），提供記者安全的指導方針、安全教育訓練，以利於記者預判，在衝突、危險區域新聞工作可能面臨危害，並懂得如何降低職業風險。同時，利用記者安危事件、問題的即時訊息釋放，IFJ同時也能夠串連起國際各地的記者、工會、媒體團體，進行資訊交換同時形成團體的集體力量，爭取記者人身的保護資源。³在2003年IFJ出版的專書中，時任IFJ秘書長的White於序言便強調，應創造風險意識成為記者的文化，他並主張IFJ立場是要求記者安全應該融入新聞專業之中，將之視為是現行新聞專業的重要一環。White同時鼓勵各國記協成員能夠根據他們的在地經驗，發展出具有在地觀的記者安全討論（McIntyre, 2006）。

值得重視的是，IFJ明確將新聞從業人員的安全定位為：新聞工作的正面內涵，能讓從業人員的新聞工作做得又快、又好。記者安全同時能夠被視為是新聞組織的資產，而不只是一種責任義務。對於個別記者而言，記者專業不僅在於如何做好報導工作和

² 進一步可參考國際記者協會官網資料，上網連結 <http://www.ifj.org/en/pages/safety-fund>。

³ 進一步可參考國際記者協會安全基金介紹，上網連結 <http://www.ifj.org/assets/docs/190/183/a7d39be-42032b7.pdf>。

完成新聞作品，懂得如何安全報導（safe reporting）被視為是專業能力的一環。而安全則被定義為：不論是新聞組織和個別新聞從業人員都能夠預先判斷風險、懂得預先準備、觀察什麼事情即將發生並且知道如何反應（McIntyre, 2006）。

為了提供更全面、廣泛的安全訓練，IFJ 也與國際新聞協會（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以及其他重要的媒體專業組織、新聞自由團體和記者工會聯合組成國際新聞安全協會（International News Safety Institute, INSI）。透過定期的報告，INSI 企圖建立一個有效的論述，讓媒體主管認同，媒體不應該讓新聞從業人員在未經過訓練下進行具危險的新聞工作；最後，INSI 建議新聞組織依循 INSI 的安全信條和專業倫理，並提供適當的訓練與安全裝備給予新聞從業人員，以持續發展安全計畫，使新聞從業人員都能夠具備安全報導的方法（INSI, 2006）。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 1990 年代也開始關注記者遭到殺害的問題，並且於 2008 年起每兩年出版記者安全調查報告並提交到傳播發展國際計畫（International Programme for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IPDC）的議會（UNESCO, 2016）。

前述幾個關鍵新聞組織的論述，嘗試建立新的新聞專業價值，批判過去以追求新聞為優先，並認為新聞組織不應該在記者不了解採訪風險、未經妥善的訓練情況下，就讓他們赴危險區域進行新聞工作。換言之，在危險情境下的採訪，原則上記者都需要獲得妥善訓練、保險、諮詢服務以及自願採訪，亦應該進行在地媒體如何落實記者安全工作的討論（Saul, 2009）。特別是提升記者在危急和具風險的情境中進行報導的專業知識與能力，有待被重視和累積（Sorribes and Rovira, 2011）。值得關注的是，這一系列記者安全的推動與安全守則知識訓練的風險情境，主要是針對具

衝突的報導環境，包括戰區、犯罪事件採訪、高衝突的集會遊行，以避免記者受到殺害、綁架、暴力威脅等。相對的，對於災難採訪或者科技災難等議題缺乏深入討論。

晚近有一些機構深知箇中問題，開始針對非戰爭、衝突性的風險環境，發展更多元的安全指引。諸如 UNESCO 與報導無疆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合作，出版的《記者安全指引手冊》（*Safety Guide for Journalists: A handbook for reporters in high-risk environments*）。自 1992 年出版第一個版本的《記者安全指引手冊》後，手冊內容歷經多次擴充修正，主要是著眼於記者安全所涉及的風險情境範圍日漸擴大。從早期只關注衝突危險環境，到 2015 年的新版本之中，增加了天然災難、流行病、性暴力（特別是針對女性記者）等，提供安全指引和實務上的建議，使記者能夠依照報導工作所面臨的不同風險情境在行前獲得知識補充。

英國 BBC 於 2009 年所出版的新聞專業安全指引手冊（journalism safety guide，簡稱 JSG），則更早針對各類天災風險和科技風險（如生化、核能和工業污染）等採訪情境建立採訪指引和風險確認等指引內容。BBC 在這本手冊之中，同時提出新聞專業安全的定義範疇，認為新聞從業人員保持安全的能力，必須包括自身安全的維護以及協助公眾或新聞的貢獻者（受訪者、指引者、同事）（BBC，2009）。近期 BBC（2016）更新 JSG 項目更加多元，包括報導壓力、心理創傷（Psychological Trauma）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⁴

整體而言，在幾個關鍵的國際新聞、媒體專業組織的推動下，重新定義了新聞專業的內涵，讓記者安全成為新聞記者專業養成

⁴ BBC(2016). Journalism Safety Guide(JSG). <http://www.bbc.co.uk/safety/safetyguides/journalism/topic-list> (Retrieved:November 20, 2016).

必要關注的職業技能和專業倫理，其中記者安全的專業不僅涉及記者個人如何自我保護，還包括如何保護新聞同僚和報導關係人；其次是強調災難報導這類具危險性的報導工作，必須要建立有利於記者進行災難報導的行動資源。此外，風險認定、準備和因應類型的逐步擴充，從早期衝突區域風險類型（如戰爭、恐怖攻擊和街頭暴力），擴增到各類自然風險、科技風險（工業意外、輻射）、意外災害（墜機、車禍）等。這也凸顯出風險災害的多樣性，驅動了記者安全專業知識的發展。

由此反思 311 這樣的複合型災難，其同時涵蓋自然風險與科技風險，內容有多樣的風險類型（地震、海嘯、土石流、輻射），記者前往的報導場地作為高風險場所，具有各項風險因素可能造成記者的身心安全受損。因此必須具備環境之中的各類風險覺察、辨識與評估的知識能力，及風險控制與管理等因應作為的知識能力。則對災難新聞專業而言，應該如何發展出記者複合風險的辨認、管理和因應的知識和能力？本文認為在多元風險的社會環境中，記者安全的專業知識無法單靠既有、已確知的抽象知識，而是應該透過源自於風險環境所產生的經驗知識，建立由下而上的知識累積模式，進而以風險經驗知識與專家知識的對話，方能有效擴展記者安全專業知識。

三、風險社會下的災難報導：反身性的知識技能

記者安全知識如何累積？從上一節有關記者安全倡議與實務知識的發展可以發現，記者安全所面對的風險具多元、複雜的特性，足以說明在記者安全的知識發展上，必須持續關注行動者所處的多元風險情境，並且促進經驗知識的累積。而情境知識的累

積則有賴於由下而上的知識取徑，這點正與風險社會所討論的知識面向具備高度關連性。

風險社會者 Beck (1994) 便批判現代社會的專業制度和工具理性的科學知識，正是造就了現代風險的邏輯產生，也無法充分協助人們面對充滿風險的各種情境。Beck 主張，風險不再是可控制、可計算的認識對象，研究者不應再用簡單科技理性來理解現代社會的運作。過去工業社會是一種強調控制、科學的體系，然而包括車諾比核災和其他大型環境災難的一再上演，顯示這樣的社會體系已經喪失解決各類風險問題的效力，因為這些災難正是在強調風險可計算、可控制的科學理性發展過程所導致的後果，Beck 稱此現象為「自作自受的不安全性」。相對於過去研究依循工業主義為主導的現代社會情境，Beck 認為應該轉向以風險社會的認識論，診斷和分析當代社會及社會行動。他認為當人們越加發現，諸多社會災難和風險是起因於強調科技理性的社會本身，那麼就會迫使整個社會產生高度自我反省、進而朝向轉型，呈現反身的現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狀態 (Beck, 1994; Denney, 2009)。換言之，現代社會本身成為批判的主體，更強調對「現代社會及其高度依賴的科技理性邏輯」進行一種根本、全面反省 (Beck, 2003; Beck, 1992; 周桂田, 1998b; Lupton, 1999)。

值得注意的是，風險社會的理論建構並非採取完全揚棄理性的立場。Beck 立論依循 M. Weber 以降低對於工具理性問題的社會學討論脈絡，因而強調風險正代表著工具理性對確定性許諾的失敗，因為由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科技生產不斷帶來新危害和不確定性。Beck 藉此凸顯出工具理性的特質雖在於風險的可計算和管理的可確定性，但未預期後果、副作用不斷出現，正反映出現代風險的不可精確計算特質，因此主張應打破工具、科技理性的壟

斷性，回到社會理性，藉由風險意識的提升、更具反思性的價值理性思考，關注個人如何因應充滿不確定的生活情境（胡光正，2007）。當人們提高風險意識，一方面會自我反省，另一方面會學習面對風險，而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一種自我建構式的社會學習，逐步從無知的情境脫離並掌握知識，這是 Beck 所主張的風險理性，也就是建立一種由下而上、富含社會價值的行動知識（周桂田，2004：7-8；胡光正，2010）。

對社會的各類行動者而言，因為社會充滿許多無法依照過去經驗判斷，不可透視、不可觸碰和直接感受的科技風險（如核能輻射、奈米、基因轉殖食物），加上重大的災難（如核災）以及不穩定的社會勞動結構等，一方面造就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充滿風險、懷疑和不安，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們質疑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包括對於傳統家庭、社會、專家機構、科學證據的質疑等。因此，行動者所面臨的生活處境也就轉變為必須自我承擔生活風險，以及學習認識和掌握生活中的風險問題（朱元鴻，1995；Lupton and Tulloch, 2002）。因而在高度風險的社會情境中，人們會對現存的社會秩序感到不安，這促使人們提高風險意識，進一步會「逼迫人們思考另一套『應變』風險的秩序模式，來確定人類在當代高速變動的社會安身立命的原則（周桂田，1998a：97-98）」。

依循風險社會討論的脈絡，這套有待發展的應變風險之秩序模式，應該建立在更多來自行動者由下而上、更具備反身性（reflexivity）的行動經驗知識。反身性概念可追溯自俗民方法論學者 H. Garfinkel 的研究，是指行動者能夠理解其所面對的情境，並且依據此理解採取適當的回應（黃厚銘，1997、2002）。許多社會學家採用反身性這個概念，強調當代社會人們對於知識使用、制度運用和自我生活實踐越來越需要依靠自我反省、批判並以此

進行選擇性的生活實踐（鄒川雄，2004：46）。例如對 Bourdieu 和 Wacquant（1992）來說，反身性作為批判和反省知識生產者慣於運用自實踐情境中抽象化而出的知識，以此來認識情境問題和構思解決之道，卻偏離了情境的複雜性（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Schirato and Webb, 2003）。

Giddens（1984）則運用反身性的概念，更清楚指出行動者追求自主和強調行動能力，必須先擁有行動情境的判斷和行動方案構思、選擇之能力。而面對多變的日常生活情境，行動者能知能力的形成，正是仰賴其具備反身性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層次進行自我和他人的監控（引自李康、李猛，2007：41-42）。他更進一步結合風險社會理論，將反身性概念聚焦在知識的反省上，認為現代社會轉型必然衝擊社會行動者的能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Giddens, 1991）。換言之，反身性概念更強調行為者依循行動脈絡、透過在實踐中所產生的知識，與情境因應互動過程中持續地形成因時制宜的應變知識和能力（Wood, 1998; Tulloch and Lupton, 2001）。

反應在記者反身性實踐的研究上，Bentley（2013）檢討過去常規研究體現的是結構觀點，因此缺乏對個體及其行動的研究關照，也將記者視為非異質、可交換、無差異的行為者。不論是制度的、組織的和專業的研究取徑，似乎忽略了記者在新聞工作過程所展現的反身性和行動能力。Schultz（2007）的研究指出，過去研究誠然認為記者的工作知識能力是根植在對於新聞專業、產製常規的默會理解（tacit understandings），也就是一種在新聞工作過程中不假思索、視之理所當然的職業知識。然而 Schultz 運用 Bourdieu 的分析架構檢視新聞工作者的每日實踐，提出新發現。Schultz 認為，當進入實際的新聞產製過程進行研究觀察可以發現，

新聞工作的運行不僅限於常規化的工作，而是需要記者思考判斷、相互爭論的部分，如此也說明新聞工作需要記者具備反身性能力。

本文認為在當代充滿不確定的新聞工作環境中，研究記者的反思能力是一項重要議題。誠如 Beck 在接受新聞研究期刊的專訪時就提到，風險帶來新聞場域的勞動環境變化，導致新聞工作者對於既有制度、知識技能進行反省、甚至質疑乘載知識技能的現存制度、進而抵抗或挪用（Wimmer and Quandt, 2006）。如此，相對於倚賴媒體組織的常規制度所建置之專業知識，發展自經常變動、不確定情境的反思經驗知識，對於發展當代的新聞專業知識顯得格外重要。在相關研究中，Machin and Niblock（2006）研究指出，面對變動中的新聞環境，新聞記者從新聞工作中累積知識，以預期和預備下一個新聞循環，幫助自我職能發展。兩位學者同時認為，大部分的新聞工作知識仰賴的是工作經驗累積，記者藉此追求能夠做好（being able）新聞工作。兩位學者也批判性的指出，相對於只是簡單的知道應該如何做（knowing how should be），記者需要透過浸淫在經驗中，發展專業知識和能力，而不是透過持有一堆關於新聞專業應該如何做的先存知識或抽象知識（Machin and Niblock, 2006）。情境中的經驗如何累積成知識與反身性有關，Niblock（2007）認為反身性是一個反思的過程，記者學習瞭解自身所處的工作情境。記者的反身性實踐是體現在兩個面向上：首先是行動中的反思（reflection-in-action），是指記者在新聞工作情境之中經驗到出乎意料、非例行的狀況，進而產生困惑而開始反思不確定和獨特的情況，記者開始反思原本不言自明的先備知識的適用性問題，並且在完成工作時生產出一個對於現象的新理解，同時瞭解自身在其情境中的轉變；第二面向是建立在行動上的反思（reflection-on-action），表現在事件之後，

透過記者閱讀自己完成的故事，讓記者發展一組內在的問題和形成新行動策略，以運用來讓未來表現更加好（Niblock, 2007）。

Ahva（2013）將專業反身性定義為：記者自我覺察的能耐，包括有能力認知對環境的影響和改變，藉此修正自我行動並且重新協商自我的專業認知與形象；Ahva 並認為，在具風險的工作場域，記者的專業反身性更成為記者安全的關鍵。運用專業反身性的概念進行經驗研究，González de Bustamante and Relly（2016）針對北墨西哥記者的研究便發現，記者在充滿暴力衝突的場域，面臨危險時會反思新聞專業規範原則的適用性，也就是反思在危險場域的工作處境，然後再形成自我專業職責的判斷。因此，完成新聞的過程中，正是體現出記者具備專業反身性。進一步，歸納上述的相關研究論點，均指出了新聞工作過程的反身性知識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反身性知識對於記者展現專業和維護個人安全的重要。

反應在本研究主題，本文認為相對於衝突研究，記者在災難新聞生產的過程中，同樣必須面對既有常規制度及日常慣用的職業知識不足之問題。而記者是否有能力認識風險情境？如何面對風險情境？怎麼在新聞工作的行動中反思？以及行動後怎麼自我檢討？這些問題都是值得不斷探究的方向。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面對災難現場這類複雜、多變的風險情境，記者須依靠反身性理解及勞動現場情境，採取多元性的應變。因而在災難新聞的勞動實踐分析中，本研究採取反身性概念進行分析，包含反身的職業角色檢視、風險情境應對。值得注意的是，反身的知識建立並非與傳統新聞專業知識與倫理斷然脫離，而是建立在記者經驗、既有專業知識架構上，具反思性地運用以作為面對實際災難情境的回應框架。如此，既有新聞專業知識和倫理

不再是一個抽象、固定的指導規範，而是轉作為反思基礎，讓行動者評估當下自身處境並因時制宜地取用、並構思可能的應變作為（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本文所探討之災難新聞專業化發展，其概念範圍不僅在於記者自我勞動安全的反思，還涉及因應災難情境反思如何做好災難報導，包括維持資訊正確性、以公共利益作為新聞產製目標，及避免對受訪者造成傷害等（林照真，2009；許瓊文，2009；Cottle, 2009）。

依循此討論脈絡，有必要進一步釐清行動能力的概念定義。在本論文脈絡中可定義為，新聞工作者的應變行動能力同時具備（1）知識面向的「知道應該如何展現應變行動」，以及（2）實踐經驗面向的「能夠如此展現應變行動」兩面。換言之，行動能力同時是建立在，新聞工作者在災難新聞工作當刻的風險，能以專業知識與過去勞動經驗為基礎，在知識層次上進行反省、建立行動方案，以及在行動層次展現其具體實踐。因而，建立行動能力係仰賴社會行動者累積行動知識、懂得善用各項知識和行動資源，以面對不同的生活情境。

進一步，本研究認為應變能力不是一蹴可及的能力，而是須經過反身思考、累積具體災難經驗知識、針對知識經驗進行再反省等過程，並在未來面對充滿風險、專業倫理衝突的災難工作場域中，持續透過循環反饋的過程，才能夠逐步擴大災難報導的應變能力。

參、研究方法

當代的新聞倫理規範與新聞生產邏輯，應該積極面對風險社會所來的理論眼光，透過正視深具風險的勞動特質，進行新聞實

務和風險的關係研究。311 災難新聞報導的臺灣記者勞動經驗，正提供了這樣一個檢討的研究基礎。實際上，自 1990 年代以來，以新聞勞動者為本位的安全議題討論，便受到國際新聞社群持續推展。在這段時間，新聞安全團體、國際記者協會、國際新聞安全協會及其他國際組織，開始推動一系列的記者安全訓練、論述與概念推廣活動，主張要將新聞從業人員的勞動安全納入新聞專業（White, 2005; INSI, 2006; Tait, 2007）。這些國際組織同樣主張安全報導的新聞專業與倫理，在方法上應該透過新聞工作者的勞動經驗來歸納記者安全的概念。

Ahva 針對專業反思性的研究指出，訪談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受邀的反思（invited reflexivity），邀請記者提供個人經驗。因此本文將選擇透過具脈絡性的個案檢視和深度訪談等質性方法，進行初探性的研究，歸納災難新聞勞動者如何在情境中，利用既有行動資源發展更多隨機應變的專業知識。因此在具體的資料蒐集，本研究以 311 災難新聞報導與勞動作為個案，蒐集與 311 災難採訪有關的各種記者勞動經驗資料（Creswell, 2007）。本研究資料概分第一手資料及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的蒐集，係針對參與 311 災難採訪的臺灣新聞從業人員，包括記者、編輯、媒體主管等，以深度訪談、團體訪談等研究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主要透過國內兩大新聞專業團體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臺灣記者協會的聯絡名單，訪談曾至日本進行 311 災難採訪報導的新聞工作者（參見表一，頁 84）。本研究對資深且具備多次災難報導經驗新聞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優點是能夠藉由資深災難新聞工作者獲取災難新聞專業相關知識、工作經驗與代表性的看法；團體訪談則參照過去 Morley、Liebesc 和 Katz 等人所採取的方法（Gray, 2008），透過邀集曾經赴日本進行 311 報導的資淺新聞工作者，由受訪者一起

參與研究議題的共同討論，有助於了解記者之間交流本身的看法和經驗，形成對話互動。訪談綱要的問題設計，主要是包含前述理論概念所討論的面向，企圖瞭解記者處在 311 的災難與風險情境之中，是怎麼形成應對和反思新聞專業，包含瞭解記者如何反思自己的角色位置、處境和做出風險應對的表現。為了貼近新聞工作的經驗脈絡，訪談大綱同時依照災難新聞工作的時序，依序從剛得知有災難發生、接受採訪任務、抵達災難現場、開始採訪需注意什麼、進行報導需注意什麼、採訪完畢後等六大綱要進行具體問題的擬定，詳細請參見訪談大綱（如附件一，頁 117）。

另外，本研究亦參與或紀錄國內舉辦有關日本 311 的論壇、演講和討論會，作為二手資料（參見表二，頁 84）。最後則對國內外蒐集專業組織、研究機構、新聞工作者、學者、或者官方組織等有關地震、輻射及海嘯的相關勞動規定加以整合及分析。

表一：本研究團體訪談及深度訪談

項次	對象	日期	年資	災難採訪或工作經驗
1	A-1 (日報文字記者)	2011/05/10	10年以下	無
	A-2 (日報攝影記者)		10年以下	有
	A-3 (核能與醫療健康專家)		20年以上	有
2	B-1 (電視文字記者兼主播)	2011/06/22	10年以下	無
	B-2 (電視文字記者兼編譯)		10年以上	有
3	C-1 (日報總編輯)	2011/06/28	20年以上	有
4	D-1 (電視國際新聞主管)	2011/08/03	20年以上	有
5	E-1 (日報影音記者)	2011/10/27	10年以上	有
6	F-1 (報社採訪記者)	2013/8/23、 2014/11/20	10年以上	有
7	G-1 (電視主播、採訪記者)	2013/12/13	20年以上	有
8	H-1 (報社採訪記者)	2017/03/06	10年以下	有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二：日本 311 災難報導相關座談會與討論會

名稱	主辦單位	日期
卓新論壇：從日本複和式震災談如何強化臺灣災難新聞報導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2011/04/14
文化批判論壇第 80 場：災難的新聞 vs. 新聞的災難	文化研究學會	2011/04/16
平面攝影記者日本地震採訪分享會	臺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2011/04/28
公視日本 311 的第一堂課	公視文化基金會	2011/11/25-26
災區傳媒的戰鬥「讓災區訊息傳到東京，傳向世界」福島縣內傳媒座談會	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	2012/05/30 **
我在福島核災現場	優質發展協會	2013/9/27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該資料連自 <http://www.nippon.com/hk/views/b00701/>; <http://www.nippon.com/hk/views/b00702/>

肆、分析與討論

當既有常規和新聞專業無法因應風險社會的各種情境，新聞工作者如何因時制宜地累積與發展反身性倫理和知識技能，來完成災難新聞的採訪報導？本節分成兩部分來討論此一問題：首先以 311 災難採訪作為個案，分析和檢視記者目前從事災難報導的勞動和社會情境，以及相關資源與規範的不足；其次則藉由經驗資料和國外有關安全採訪的研究與實踐論述，分析歸納災難採訪過程中新聞工作者因應風險之參考架構，特別強調新聞產製過程的不同新聞工作者的反身性和因應情境所採取的策略。

一、311 災難報導的風險情境

（一）勞動風險情境：在不確定性中進行採訪工作

在 311 地震發生後，臺灣許多媒體第一時間就開始調派記者準備前往日本進行採訪工作。這些被指派的記者，不論是懂日文、略懂日文甚或不懂的，紛紛搶搭飛機前往鄰近災區的東京（許瓊文，2011）。一如過去研究顯示，災難新聞往往促使媒體大批動員，一窩蜂採訪也考驗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如何因應充滿危機的採訪環境（Quarantelli, 2002; Duhe' , 2008）。

根據訪談資料，國內媒體業者都強調災難新聞報導過程中，新聞工作者的人身安危重於一切，其次才考量採訪任務。如擔任衛星新聞台日文編譯、被電視台派到日本臨海災區進行採訪報導的受訪者 B-2 表示，

到了第三天其實我的長官已經跟我講說，你要注意一下不要到海邊。那時候我心裡就想說，可是你要叫我去採訪海嘯侵襲的災區，你叫我不要去海邊，我要怎麼做？出發的第三天，（我）還是有到那個青森的八戶的漁港，就是被海嘯侵襲的地方。到下午我的長官就跟我講說先不要去，因為不斷的有餘震（2011/06/22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B-2）

受訪者 B-2 在交通中斷及日本官方要求災區通行證等限制下，花費近兩天時間才抵達採訪地點。然而由於 311 後餘震不斷、亦不時發布海嘯警報，促使媒體業者為記者安危而要求記者放棄採訪計劃。隨後因為臺灣外交部發布紅色警戒，即便他希望冒險採訪，仍遭主管要求立即返國。

媒體業者要求記者撤回臺灣的決定，主要是因為福島核電廠機組陸續在 3 月 12 日與 3 月 14 日發生爆炸，唯恐輻射問題傷害採訪的記者。在報社任攝影記者的受訪者 A-2 說，

要去也是公司決定要去，要撤也是公司決定一定要撤。去，當然是因為日本跟臺灣關係親近，大家認為這麼大的災害應該派人去；要回來，我想是那一天幾乎所有同業都在那一天被通知要回來，起因就是臺灣看到核電廠爆炸新聞，不願意讓記者去擔這個責任（危險），而且記者出了事公司就是有這個責任（2011/05/10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A-2）。

輻射災害因為較為特殊又難以防範，而成為媒體業者的關鍵考量因素。在日本官方尚未正式發布警戒範圍以及輻射外洩資訊時，只能要求記者進行採訪時必須遠離福島（2011/05/10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A-1）。隨後確認輻射外洩後，多數媒體便紛紛要求記者立即撤回。

不過，少數媒體在核廠意外後，仍持續外派記者至日本採訪，但在沒有經驗的狀況下，僅能將所有「理論上」可能需要的防護設備都做準備，包括碘片、防護衣、護目鏡、襪套、吃的、用的一應俱全。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輻射風險亦缺乏足夠認知，包括多少輻射量將危機人體健康、受到輻射影響造成哪些生理傷害等面向的知識，都相當缺乏。本研究發現，前往日本災區採訪的記者，即便具備災難報導經驗，卻多僅限於天然災害（如地震、水災），過去都沒有在輻射風險環境下的採訪經驗。然而輻射安全實際上是可透過事前補充的。在受訪時，輻射問題專家就指出，維護個人安全、瞭解如何使用防護設備，確實有必要，這樣方可以確保記者在核災區的採訪人身安全。記者必須瞭解輻射與健康的知識，避免因為高劑量輻射所產生的急性症狀（疲倦、嘔吐等），以及避免罹患癌症的風險增加（如甲狀腺癌、白血病、淋巴癌等）。因此建議記者採訪回國之後仍然需要事後的追蹤檢查，以瞭解輻射對記者健康可能產生的影響（2011/05/10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A-3）。

因此，赴日採訪的記者雖然攜帶了各種防護裝備，但實際上這些設備如何使用、何時使用、以及在採訪現場可能遭遇到的相關問題，卻是媒體管理單位所無法「控管」的風險。從訪談資料可以發現，國內赴日進行 311 採訪的經驗顯示，即便新聞工作者有裝備，但為了讓新聞工作順利，到了有輻射風險的現場進行

採訪，也選擇不穿防護衣，「防護衣我們沒有穿到，因為現場沒有人穿（2011/06/22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B-1）」。一位具備多次災難採訪經驗的主播坦言，為了報導災後復原狀況，她前進日本輻射重災區，雖然隨行攜帶輻射偵測機，但在採訪途中卻任其發出警訊亦未採取特別的防備，僅是自我提醒要縮短採訪的時間（2013/12/13 深度訪談逐字稿 G-1）。另有記者則是看到災民沒戴口罩，帶著「那就跟他拼了」的心態，連基本的口罩防護也不做，進行採訪工作（2011/05/10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A-1）。這種碰運氣、新聞工作優先或忽略科技風險所帶來的危害等情事不斷發生，最終也出現一個令人遺憾的結果。本研究發現，國內某大報，在 311 大地震發生後第一時間，就派出一組新聞團隊前往福島進行採訪。採訪過程中，發生福島核電廠爆炸，該組記者仍持續前往仙台進行採訪工作。直到東京被測到超量輻射的消息傳出，報社才通知該組記者返台，抵台時就有記者被測到身上衣物輻射值超標，但並沒有被輔導、進一步到醫院進行健康檢查。後續該新聞團隊之中，一名正值壯年（當時年約 30 歲）、平常身體強健的記者，陸續發生身體不適情況，2013 年被確診發現罹患肺線癌。雖然開始接受治療，但癌細胞很快轉移到腦部及淋巴，2014 年 11 月該名記者最終治療未果而過世。根據本研究訪談發現，這名記者在發現罹癌後，相關問題便直接由該報社最高行政主管負責，雖然無法釐清其罹癌是否因為 311 災區採訪工作所導致，然而該報社在治療過程中不僅負擔其醫藥費，同時在該名記者住院期間持續支付其薪資。在記者過世後，該報社另外私下支付記者家屬慰問金（2013/8/23 訪談逐字稿 F-1）。此憾事發生後，該報社工會特別就此提出要求，要報社建立災難採訪標準流程（SOP）。該報社人事部門於會議上允諾建立 SOP。然而在 2016 年熊本大地震爆發時，

仍然在缺乏標準流程和裝備提供的情况下，指派報社記者前往災區。雖然這兩名記者具有災難新聞工作經驗，卻仍因為在熊本縣遭遇餘震、買不到東西及飲用水，而發生與災民一同接受救難物資的情況（2017/03/06 訪談逐字稿 H-1）。就此先後事件來看，顯見國內媒體新聞產製制度，仍高度缺乏對於記者安全之關切，亦缺乏從自然災難及科技風險經驗中，進行新聞專業制度反省和知識建構的能力。

進一步，前述罹癌逝世的記者及其同僚，過去曾經有臺灣的八八水災、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等災難採訪經驗，雖然這些經驗被相信是有助於他們面對 311 地震災區的種種自然災難所帶來的風險問題。然而在面對輻射外洩等科技風險時，卻相對缺乏有效防護裝備準備和科技風險因應的知識。由此可以發現，即便具備災難採訪經驗能有助記者面對類似風險問題，然而因為個人經驗知識仍具侷限性，而媒體又缺乏系統化的風險因應制度設計，因此記者在此次經歷中，未能意識到輻射所帶來的高科技風險，例如避免因為空氣和水的媒介導致身體特定器官之輻射病變，以及返台立即前往專門醫院進行輻射相關健康檢查。換言之，不論是記者或報社組織均未具備面對科技風險所需的充足知識和制度設計。由此凸顯出新聞安全及專業倫理的發展，不僅需關注常見的天然災難風險，更需聚焦於各類的科技風險。

另外，心理層面的傷害或負面情緒也是許多媒體無法以過去經驗所處理的風險。例如一位電視台主播提到災難現場報導後，自己遭受的心理衝擊，

壓抑自己的心情，告訴觀眾你現在聞到的味道，是消毒水的味道、是屍體的味道、還是魚的味道，在那個採訪

過程中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大川國小，然後那個國小可能一百多人死了八十幾個，小朋友的書包就一整排排在海堤邊，你在現場，就媽媽在你後面哭，然後小朋友的書包就排在旁邊，那個心情上…很感傷…跟記者說回來後心理要重建一下（2011/06/22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B-1）。

這些是報社在記者進災區採訪前，未有足夠經驗先行訓練、未事先安排足夠行前訓練、事後同樣無法給予記者協助的問題。另外一位深具戰地、災難採訪經驗的新聞主管，反省 311 震災的問題，特別指出新聞媒體在既有制度設計上，未能有效掌握記者採訪過程所出現的身心問題。

我覺得安全可區分心理和生理兩種安全，記者去災區難以掌控。輻射造成記者心理壓力比生理壓力還要更大。因為心理壓力是他要跟媽媽交代，輻射萬一不能生小孩怎麼辦？這個部分已經超乎記者本身場域上面的壓力，複合式壓力（2011/08/03 深度訪談逐字稿 D-1）。

臺灣媒體主管雖然憂心記者安全，不過勤前教育與平時訓練卻普遍付之闕如，記者也反映自己面對危險因為缺乏充足訓練和裝備，對於現場狀況難以應對，只能「憑運氣」（2011/06/28 深度訪談資料 C-1）。這反映出新聞工作者在災難採訪過程中，面臨風險必須自我承擔、掌握、和因應的風險處境（朱元鴻，1995；周桂田，1998b；Lupton and Tulloch, 2002）。因此，如何學習認識風險和自我維護安全、善盡災難報導責任，不僅是如過去風險社會學所提及的生活問題，更是新聞勞動場域的重要議題。

(二) 風險與專業挪移：從災難採訪報導經驗中反思專業倫理

記者身處在充滿風險的災難採訪情境中，往往需要採取更策略性地挪用新聞專業，以更具反省性的方式進行災難採訪工作。此外，由於採訪工作需要團隊合作，包括臨時組成工作團隊，與災民合作，這些都是災難報導中專業規範與勞動安全必須關切的對象。例如：

從地震發生開始到逃離海嘯的途中，我心中一直有個念頭，那就是絕對不能死掉，絕對要活著回去。因為我死了，那就表示和我同行的計程車司機也會一起喪命，我絕對不允許這狀況發生（入將沙也可等，2012：175）。

另外，記者在新聞採訪工作的過程中，反思如何避免受訪災民遭受二次傷害：

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故事，我們很要求故事這種東西，所以我們就要去問他發生什麼事，有沒有誰過世，然後怎麼樣災後什麼重建情形，所以就只怕會問到他們就是…去碰到他們的痛…有一個老人來，其實我只是訪問他的媳婦，然後他在旁邊聽了就哭了，就忽然大哭，然後他媳婦也哭了（2011/05/10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A-1）。

臺灣過去處理災難新聞時，慣於採取細節描述、故事化與煽情報導的方式，也往往容易引發侵犯災民隱私或者造成災民二次傷害等新聞倫理問題（許瓊文，2009）。記者在 311 採訪經驗中，也在災難情境中出現對自身專業倫理的反思，甚至對於自己採訪

災民造成對方情緒的自責，將維護災民身心權益視為是災難採訪專業內涵。例如，受訪者 B-1 所屬的媒體集團素來以追求收視率、商業化的新聞報導為名，然而記者特別提到所屬的同行長官並未要求採取挖掘災民受災細節或隱私的手法：

到了當地，你自己也會知道他們失去非常多，你也會知道不要去碰觸他們很傷痛的部分，……甚至是在拍攝的時候會避免，或糊焦就是不要讓他們曝光。當時我們去的時候有很多地方都在舉辦葬禮儀式，那他不會阻止你拍，但是他希望你給對方一個尊重……因為我們是希望他們找到重建的力量，而不是說去剝開他們的傷口（2011/06/22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B-1）。

受訪者 B-2 也提及這種風險情境下的新聞工作者反思，他曾經歷 921 大地震的災區採訪工作，當時他作為一個新進記者被新聞室主管要求，去訪問一位災民。然而，對方雖在現場是已經脫困的狀態，但他的小孩卻正被埋在廢墟底下。這段經歷讓他深刻反省，災難採訪應該如何尊重災民，以及明辨採訪時機（2011/06/22 團體訪談錄音逐字稿 B-2）。

因此，對於缺乏具體災難新聞專業訓練的新聞記者而言，過去相關經驗的累積雖有助於提升其因應各項風險的能知能力，但需要同時經過一個「事後自我反省、檢討」的過程，這樣才能夠將經驗轉化為有用的能知能力。同時，因應風險社會中的不確定性，經驗反思成為災難新聞報導專業化的必要途徑。

二、具反身的經驗知識、行動框架：災難新聞實踐經驗與勞動主體關懷

從第一部分的分析討論，可以發現記者災難報導的勞動處境，同時需要兼顧新聞工作者自身、新聞報導關係人的身心安全，新聞採訪工作也更要顧慮受訪者，避免對方因為接受採訪或者被攝影捕捉，而造成二度的心理傷害和情緒反應。更為重要的是，新聞工作者需要讓自己的災難新聞報導能夠協助災區的觀眾、廣大社會大眾避災、減災，以逐步恢復應有的健康安全狀態。此研究結果與卡崔娜風災後的研究發現相似，也就是在災區地方記者新聞實踐情境中，呈現更多的反身性思考：記者們一方面認知客觀性報導規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因應社區處在災難危及的情境下，更傾向直接鼓吹災區的需要（Usher, 2009）。這種強調風險因應和安全維護，以及反思如何善盡災難報導的公共責任等災難新聞勞動倫理，是過去國內災難新聞研究仍缺乏足夠關注之處。

在缺乏風險社會中災難新聞的專業論述情況下，記者需要從勞動經驗和情境出發累積能知能力、提升災難新聞專業能力，立基災難新聞工作者的勞動經驗、以及對經驗的反思，藉此持續建立由下而上的實踐參考架構顯得格外重要。因此以下透過訪談經驗資料和國內外有關安全採訪的研究與實踐論述，依照新聞採訪過程的不同階段，本研究嘗試歸納具體災難報導因應經驗和倫理規則，由下而上歸納可供記者參考、因應災難風險參考架構。本文需進一步強調，這樣的參考架構是建立自行動者由下而上、更具備反身性的行動經驗知識，以作為行動者之參考，而非抽象、強制性規範原則。

（一）前進災區前：記者的安全訓練與裝備準備

受訪者往往會強調記者赴災難現場前，首先應該有權自我決定是否赴災區工作，這種同意採訪勞動權的概念主張，新聞勞動者不須一味迎合新聞組織的要求，而應依據個人主客觀因素進行考量，再決定是否接受災難採訪工作，需檢視自己的災難採訪能力，以及公司是否能夠提供完整的防護措施（2011/08/03 深度訪談 D-1），此外媒體公司要能夠給予較完整的勤前訓練，可分成採訪規範、採訪技巧、人身安全等三部分（2011/06/28 深度訪談 C-1）。Saul（2009）強調，新聞組織應該讓記者在了解採訪風險、並且經妥善的訓練的情況下，再自行決定是否願意前往赴危險區域進行新聞工作，獲得妥善訓練、保險、諮詢服務以及自願採訪。

從本研究訪談資料可發現，國內重要的廣電媒體、平面媒體組織主管及新聞工作者，特別關注到採訪報導的事前風險評估。整體而言，記者是否應該接受災難採訪工作新聞工作者，事前風險評估可區分對組織及對個人這兩個面向的評估，包括（2011/06/28 深度訪談 C-1；2011/08/03 深度訪談 D-1；入江沙也可等，2012）：

1. 對新聞媒體組織的評估：包括（1）新聞媒體組織是否提供能滿足採訪需要的安全裝配；（2）新聞媒體組織是否提供充足的醫療與保險給付；（3）新聞媒體組織是否提供充足的採訪團隊人力及能力等。
2. 對自我能力的評估：（1）是否具備充足的語言能力進行災區現場的採訪；（2）是否具備相關採訪經驗以及資歷；（3）個性是否夠開朗；（4）家人是否能夠被說明和支持這樣採訪工作等。

此外，這次國內參與 311 報導的新聞工作者，針對災難前的準備，大抵強調物資裝備的重要性，包括個人物資裝備（如雨衣、乾糧、飲用水等）、急救裝備（如救難包、簡單的醫藥裝備等、因應災難的社會情境所需準備的採訪工具等），亦有新聞工作者強調心理衛生健康的防護，同時具體建議，應該攜帶能夠增加安全感的物品（如平安符等）（2011/05/10 團體訪談 A-2；2011/06/28 深度訪談 C-1；入江沙也可等，2012）。國內新聞傳播研究者針對 311 事件，便認為透過裝備與妥善的事前訓練工作，同時能夠增進記者災難報導的應變能力，加強其生理和心理的防護能力（許瓊文，2011）。綜合而論，物質裝備、知識訓練與身心防護亦有相當的連結關係。

（二）進入災區：記者對災區現場的風險應對

過去 IFJ 有關安全報導作為記者專業的討論以及採訪實務守則制定上，大致強調預先的知識教育訓練與物資準備、保險機制的建立等，在其出版的安全報導相關的工作手冊之中，針對記者實際進行危險區域進行採訪，則是側重戰爭、衝突區域情境下的安全報導指引（Mclintyre, 2006），直到 2008 年中國四川發生大地震，IFJ 特別在原有的安全採訪實務守則中，附加自然災害採訪的資料，內容中有關災難現場進行採訪因應的注意事項，包括：（1）具備緊急應變措施；（2）進行採訪工作時，遇到餘震時應該處在安全空曠的地點；（3）派赴災區應該注意現場安全問題、交通安全；（4）備妥急難包配備以隨時進行自我簡單傷痛治療；（5）完備的隨身物品；（6）注意受訪災民是否具備災後創傷症候群也應避免自己因為工作出現類似的心理問題，若有則要適時設法排解或尋求專業管道協助。以上這些注意事項反映出，維護災難記者現

場的身心安全，仰賴的是安全的勞動知識、充足的物資裝備和新聞組織形成有效的組織合作和機制措施等三個面向。

從此次參與 311 採訪報導的記者經驗資料，可以發現許多媒體公司在臺灣新聞室設有負責與前線記者聯繫的專門人員，同時會要求前線記者每日定期與新聞室進行聯繫，除了回報採訪規劃、進度之外，還包括確認採訪團隊的人生安全問題，一名電視台編譯還特別提及，一旦聯繫時新聞室認為採訪內容涉及記者安全問題，會以安全為優先考量而要求記者放棄該項採訪工作。國內某大報雖然為記者備妥採訪和防護必備的物資，然而仍以安全為上，要求記者撤離宮城縣，「公司也很矛盾，他叫我們不要去，可是又準備那些東西…（2011/05/10 團體訪談 A-1）」。另一位記者也談到自己費好一番功夫抵達遭海嘯衝擊的災區，在臺灣的新聞室也基於安全，要求其撤離（2011/06/22 團體訪談 B-2）。

相對的，由於災區喪失正常的社會功能，特別是許多資訊不完整，提升了記者勞動的危險性。受訪者 C-1 在國內知名報社擔任總編輯，311 災難期間他帶領同事前往日本採訪後，其回顧自己在災難採訪過程和事後的反省，「（新聞室）後勤做的不錯，會提供資訊，定時由專人與日本當地記者連繫」（2011/06/28 深度訪談 C-1），這些資訊包括隨時提供災區完整、確切的交通狀況、天氣狀況、災情進度以及所需物資的狀況，同時採訪行程採取彈性可變動的安排，以確保前線記者能夠遇到突發狀況能夠隨時應變，到比較能夠確保記者安全的地點繼續進行災區採訪的工作。這說明了新聞組織建立災難採訪情資和溝通協作制度的重要性。

而在災難現場進行採訪工作時，既有相關的制度和手冊強調，現場記者進行實際注意、避免危險發生的事件，包括注意警覺現場災民可能的危險舉動，例如強奪（BBC, 2009）、災區具

有的危險因素，包括會造成觸電的電線、泥濘的道路、受損的建築物、海嘯警戒的濱海道路，避免前往受到核能污染的災區區域（2011/05/10 團體訪談 A-1、A-2）、災民面對採訪可能引發的強烈情緒反應（2011/06/22 團體訪談 B-1），或制止採訪的激烈行為（2011/06/22 團體訪談 B-2）。因此，記者應該盡量避免造成因為投入採訪工作而讓自己、同伴或受訪者面臨身心的危害。遇到需要緊急逃難時，也應該毫不遲疑的運用既有的採訪經驗與知識，迅速判斷、採取最適合的逃難方式，如 311 當日於福島進行新聞採訪工作東北放送記者武田弘克，當時發現河川的水被抽乾，武田立即判斷將會有大海嘯發生，一開始便趕緊搭乘計程車逃離，後又發現到公路塞車便立即與計程車司機一同棄車逃命，同時找到適當的方式一邊逃難、一邊記錄現場，展現出一個高度的風險應變的勞動經驗（入江沙也可等，2012）。

擔任電視國際新聞主管的受訪者 D-1 則提到，新聞採訪工作如何透過團隊的相互照應來維持新聞工作人員在災區現場的安全。由於攝影師往往專注於現場拍攝也容易忽略周邊可能的危險，因此文字記者便需負責維護攝影師的採訪安全（深度訪談資料，D-1）。另有記者在受訪時提到，因為採訪過程中同事受傷，其他人便協助他的裝備、物品攜帶（2011/06/22 團體訪談錄 B-1），上述說明了，國內平面與電視媒體在實際的災難採訪經驗中，正體現 IFJ〈採訪自然災禍 - 地震〉所強調的，新聞記者與同儕一起採訪需互相照應的倫理準則。

NHK 記者戶田有紀則提到，災難採訪過程中容易陷入情緒和心理的負面衝擊。根據她的 311 災區採訪經驗和事後反省，即便在災區也應該給自己適當的休息和睡眠時間；其次如果在報導期間自覺到心理壓力，應該透過與同儕聊天、情緒宣洩等方式適時

紓壓；第三，是了解災區報導條件不佳，記者往往會有強烈的挫折感，這時應該努力藉由自我工作價值的重新發現，減輕工作的挫折感（入江沙也可等，2012）。

歸納上述的經驗，311 災難採訪報導的新聞工作者強調，記者除了必須具備採訪經驗、裝備還有知識外，災難現場的採訪則更強調保持和察覺危機的意識能力，以及透過採訪團隊和新聞室進行團隊協作，以此來決定和判斷如何兼顧新聞工作和勞動者的身心安全的兩廂平衡。再者，記者不僅是依循常規的勞動者，在災難現場他們因為面臨勞動風險的增加，不僅提高危機感，更會反省新聞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如何在新聞常規不適用於災難情境的狀況下，援引更多外在新知和團隊協作，來增加災難採訪的專業內涵。

（三）執行災難採訪報導：災難新聞採訪注意事項和可用手法

依循既有的新聞倫理與新聞價值規範，新聞工作者前往災區進行災難報導的主要因素在於，要提供民眾充足、具品質的第一手災難資訊、畫面，藉此滿足媒體企業爭取收視率的需求或滿足新聞被賦予的社會責任（Hansen, 1991; Bennett and Daniel, 2002；孫曼蘋，2000；林照真，2009）。然而從新聞勞動的角度反思，有關記者如何安全的完成採訪報導，在相關的應用研究與實務討論經常都是付之闕如（Richards, 2007）。

本研究透過從數次焦點團體訪問與業者訪談，參與人員包括此次實地赴日本採訪之報社與電視記者、輻射醫學專家、及媒體主管等，獲得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同時蒐集國內外各項相關要點和論壇討論。有關安全的災難採訪報導，整體而言可歸納為兩個面向：安全的採訪以及安全的報導。

首先在安全的採訪部分，包括下列數項經驗歸納：

1. 在災區先訪問誰：女性老年人比較容易接受訪問，另外可以尋找在當地留學的學生或者臺灣移民（2011/05/10 團體訪談錄 A-1、A-2；2011/06/22 團體訪談錄 B-2），須注意的是，應該避免對特定人士進行採訪，恐怕會造成其精神壓力與負擔（日本記者壓力研究會，2011）。
2. 訪問災民需徵得事先同意：有記者認為必須要在災民事先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夠進行採訪並詢問災情狀況（2011/06/22 團體訪談 B-2），在接觸時也應該體恤對方、保持敬意，甚至多花一些時間進行自我介紹並說明採訪要採訪的事項（日本記者壓力研究會，2011/03/21）。
3. 訪問災民的注意事項：（1）行前先了解當地的宗教文化信仰，嘗試以此與災民進行連結並多傾聽災民的心聲；（2）受訪者有權隨時中止採訪；（3）受訪者有權決定要怎麼回應記者、是否提供照片使用以及應該如何播出這段採訪內容；（4）以具同理心、簡單的方式提問；（5）不承諾超乎能力的事；（6）對災者在受訪時有的情緒反應有所準備；（7）夜晚休息時間有時可能是一個適當的採訪時機；（8）應該多關注災民需要那些物資和特別需求；（9）不要讓受災的民眾因為採訪工作而遭受二度傷害；（10）不應該突兀、片面的結束訪問；（11）嘗試在採訪過程讓受訪者感受到，並不是採訪結束就算了，還會持續關心災民的生活（入江沙也可等，2012；2011/06/22 團體訪談 B-1）。

4. 災民拒絕接受採訪的應對：當受訪者有負面反應就應該表達尊重。不做侵入式採訪，此外災區當地某一類的人往往比較容易產生機動和情緒的反應，記者應該先行了解再進行受訪者的選擇（2011/05/10 團體訪談 A-1、A-2；2011/06/22 團體訪談 B-1）。
5. 對於官方記者會的應對策略：日本官方記者會往往對事情有所保留，記者應該勇於傳遞不滿意的態度，並且持續挖掘問題、不輕言放棄。
6. 在國外災區進行災難採訪報導需注意的特殊因素：在國外進行災難採訪時，當地往往對於進出災區或者進行災難採訪有特殊的證件的規定（2011/05/10 焦點訪談 A-1），此外在災區採訪也可以盡量訪問高層官員，讓其他下屬知道記者的採訪受到許可（2011/10/27 深度訪談 E-1）。

其次，針對災難事件應該採用什麼報導方式，不僅是單純的技術展現，尚關係到新聞記者如何反省和體認災難報導的重要性（Niblock, 2007；Usher, 2009）。過去國內的災難新聞研究反映出，災難新聞必須追求特有的專業倫理，也就是應該追求有益於災民避災、減災的資訊報導，另一方面在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的推動下，災難新聞應該讓災民獲得更多有益於避險和災後恢復正常生活的論述，逐漸被視為是安全報導的重要國際論述。在具體的新聞勞動實踐上，本研究歸納 311 災難報導的經驗發現，安全的報導涉及一連串問題及可注意的事項，整理如下：

1. 可採用的報導原則：依照 NHK（2011）有關災難報導的手冊指出，（1）播報緊急情報時，記者應該以簡潔易懂的原則進行採訪和新聞製作，以利於正確訊息的傳播和觀眾的理解；（2）記者在思考報導工作時，應盡力減少災民受災情況與避免造成社會混亂；（3）新聞工作者應該將受災情況，盡可能地迅速傳達出去；（4）記者應該對閱聽人發出各式各樣的警告及注意事項，提醒閱聽人開始採取避險的行動；（5）新聞報導應該關注災後災民的生活，包括如何使其平復災難所造成的負面情緒和心理創傷，創造社會的信心、相信災區重建和災民能夠恢復正常生活等（許瓊文，2011；日本網，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2012；入江沙也可等，2012）。
2. 可避免採用的報導手法：歸納參與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和深度訪談的災難記者，多認為（1）新聞應該避免過度描述災民的悲傷，以免造成災民觀看新聞產生二度傷害；（2）新聞應該善盡查證，同時避免不實消息造成社會混亂；（3）新聞編輯避免訴諸感官新聞的處理，諸如要避免過度使用重新剪輯受災者新聞片段、採取催淚和感性的新聞筆調、配樂等（2011/05/10 團體訪談 A -1、A-2；2011/06/22 團體訪談 B-1、B-2；2011/06/28 深度訪談 C-1；2011/08/03 深度訪談 D-1；2011/10/27 深度訪談 E-1）。
3. 可採用哪些報導技巧：（1）純紀錄片手法：表現出適當的新聞敘事邏輯，串成完整的災難故事，如果報導時間較長，應注意受訪者的表達能力，並盡量有多

個地點的畫面；(2) 普通新聞呈現：採用最簡單的記者旁白，加上受訪者訪問和相關畫面；(3) 增加專家和動畫、圖卡比重的報導：平時就應事先規劃相關的學者，例如地震、海嘯、寒害、鹽害、沙塵暴之類的學者專家，災害發生時最好能邀請他們隨行到災區現場做直接的說明。用合理的動畫或專家訪問的方式，能夠幫助觀眾盡可能詳盡瞭解現場可能的狀況，但又不失真、誇大（2011/10/27 深度訪談 E-1）。

（四）災難採訪之後：先重整身心健康、再進行工作反省

有關災難新聞採訪的實務討論，傳統的新聞專業論述，往往強調記者完成採訪工作任務為優先，造就了新聞工作場域中記者強迫自己堅強、不示弱的英雄文化（Aldridge and Evetts, 2003; Duhe', 2008），也因此往往忽略了新聞記者也會因為目睹災難現場或感染災民的負面情緒，承受多重的工作壓力，引起心理創傷問題（許瓊文，2009；Tait, 2007; Bennett et al., 2010; Buchanan and Keats, 2011）。從本研究所蒐集到的 311 災難個案經驗中可以發現，包含日本和國內的災難採訪經驗都反映出災難採訪的勞動過程，形成記者高度的心理壓力。

有些記者自災區採訪完畢，返家後開始發生失眠、無法忘記災區畫面的情況，回到臺灣進行新聞畫面後製剪輯時，情緒仍無法控制、嚎啕大哭。例如受訪者 B-1 就說：

我跟我做帶子的記者，就是兩個人一邊看剪帶一邊坐在那邊哭，就是真的自己在那邊哭，因為你當下採訪的時

候沒有痛苦，可是你自己回來看的時候才知道說，原來你經歷過這些事情（2011/05/10 團體訪談 B-1）。

有類似經驗的 NHK 記者戶田有紀認為，這是因為災難採訪工作累積了許多壓力已經超乎心理能夠負荷的程度，因此尋求 NHK 公司提供的心理諮商的協助，並且與能了解自己災難採訪工作的同事、上司聊天，藉此釋放壓力是災難記者自我保護必要的做法（入江沙也可等，2012）。

過去臺灣新聞自律委員會曾制定自律守則，強調記者在採訪重大災難過後，應該進行採訪後的心理諮商。如果記者發現自己出現了創傷壓力明顯症狀，這時記者就應該立即尋求公司協助、尋找專業的心理諮商（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增修三章第四條「災難或意外事件」處理條文 2）。然而究竟記者如何評估自我的心理是否受到創傷？過去國內缺乏關注。本研究發現，過去 IFJ 因應 2008 年四川大地震所擬定的地震採訪注意事項，便採用香港心理學會所設計的情緒壓力測試，要求記者應該回想一個月內是否出現以下情況，藉此可判斷是否尋求更進一步的心理諮商、協助。

由於 311 災難事件涉及輻射外洩這項特殊的風險問題，因為會對身體健康造成的傷害，卻又難以一時判定。因應此一特殊狀況，具輻射問題專業之公衛學者在焦點訪談中建議，記者從 311 災區返台後，應該進行持續的健康檢查，讓專業的醫療人員來協助我健康安全（2011/05/10 焦點訪談 A-3）。國內參與 311 災難報導工作的平面跟電視新聞媒體的主管，根據其經驗，也認為應該讓前往災區採訪的新聞工作人員進行持續的健康檢查（2011/06/28 深度訪談 C-1；2011/08/03 深度訪談 D-1）。

在優先確定身心健康安全之後，不少國內外的新聞工作者認為需要回到新聞專業進行反思，如此才能累積災難新聞專業。其中涉及到應該反省的幾個議題包括：自我檢討，想想當時哪些是沒做好的？應該如何做好的工作？同時進一步認識災難報導工作的專業特質？而此一反省工作，不僅是在知識層面累積記者的災難報導專業，部分記者甚至將之付諸實現，也就是從前一次災難報導工作的經驗和反省後，累積災難新聞的勞動知識，持續進行災區的災難報導工作，諸如原本在 NHK 東京總部擔任記者的戶田有紀，在 311 災難後自我反省後，自覺災難報導工作不僅是一個單一事件的報導，更應該是持續的關注，因此申請轉調到 NHK 仙台支局，持續進行災區報導工作（入江沙也可等，2012）。

誠如過去相關研究指出，記者在風險情境中的反思行動和經驗累積，是發展風險專業知識的重要基礎（Machin and Niblock, 2006; Niblock, 2007; Ahva, 2013; Bustamante and Relly, 2015）。因此本研究認為，前述各階段的討論可以作為未來記者因應各種災難風險的新聞勞動參考架構。這個參考架構以累積經驗知識的觀點出發，歸納整理出一份可作為實際勞動實踐的災難報導勞動參考框架，以提供記者因應具體災難採訪情境的勞動參考，以作為提升其風險勞動知識資源之用。⁵

⁵ 《臺灣災難新聞訪採手冊》，資料可連結下載自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2hzlMZxd-ycVhYUFBGYzhTYkNpSXhoVIFxVzJNUQ/edit?pli=1>。

伍、結論

晚近學界與實務界逐漸關注記者採訪工作所具有的風險問題，並主張記者勞動安全是專業化過程的重要環節。反應在本研究主題，災難記者在勞動過程中，必須發展出一套災難報導之應變風險的行動策略和能知能力。本研究透過 311 複合式災難報導的經驗研究，嘗試瞭解記者所身處的風險情境，並分析其如何進行災難報導，以挖掘災難新聞工作者如何展開有效地風險應變行動策略（Saul, 2009; Sorribes and Rovira, 2011）。本研究發現，日本 311 複合式災難包括了天災（地震、海嘯）、科技問題（核能科技）與人禍（電廠防護與管理、日本政府初期隱匿核災等），因而構成複雜、多重的風險問題。不論是日本或國內的記者，在充滿不確定的勞動條件過程，以及面對各類風險的能知能力有限的狀況下，無法有效因應各類風險，以致於出現因為採訪工作而造成的身體傷害或心理壓力，甚至有國內記者疑似採訪後因為輻射風險而罹癌死亡的案例。這些在高風險場所的脈絡所形成的風險因應經驗，說明了新聞工作者投入高風險情境所遭遇的種種困難，特別是諸多新聞工作者不乏具有風災、水災經驗者，但對 311 複合式災難這個大規模、高張力的災區景況，以及災難新聞工作所產生的心理壓力，無法有效調適。此外，記者對高科技風險（輻射），普遍出現因應知識不足的問題，直到參與本研究所舉行的專家會議，從輻射專家的說明之中，方能意識到當時的採訪經驗所涉及的高輻射風險問題，而形成災難新聞工作後的反思。

由此可以進一步說明，建立具風險社會觀的災難新聞倫理，正仰賴研究者透過了解災難記者的勞動脈絡、風險應對經驗。這

個過程也高度仰賴記者反身性地理解自身勞動性質，並挪用傳統新聞專業部分內涵，從而隨機應變地策略性運應新聞工作技能，進而從各種應變經驗累積，才能逐步建立更為多元的災難報導實踐力（Niblock, 2007; Usher, 2009; Wood, 1998）。透過具體的災難新聞勞動經驗、由下而上的形成勞動知識，也讓在地媒體和新聞工作者能夠彼此參照，逐漸發展出貼近於記者勞動脈絡的災難報導知識，以及災難新聞倫理內涵。

總體而言，透過研究可以發現，災難記者當下的知識經驗累積、風險因應經驗，都將透過反思而累積、轉換成為未來增進記者災難採訪的專業知識。對記者個人而言，亦是累積其災難因應的能知能力。進而亦有助於本研究在結論中，批判性地反省現代新聞專業知識與制度之不足。特別是面對越來越頻繁的風險、災難情境條件，不論是現代新聞倫理和已建置的新聞常規制度，均須更具風險社會觀的反思。

作為初探性研究，本文最後提出幾項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建議。首先，本研究主旨、研究資料集中在新聞記者在 311 爆發後、搶救期之災難情境的報導經驗和事後反省，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拓展，探究在災難管理的不同階段，包括災難預防（prevention）、整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等，新聞媒體如何善盡其角色？以及如何發展災難新聞專業和倫理實踐？這部分近期陸續開始有新研究成果的出現（如林照真，2013）；其次，重大災難爆發時，災難管理者、政治權力者恐擔心被媒體咎責，進而出現某種程度之新聞管制措施，在 311 事件後檢討即發現這類情況。則政治權力與災難採訪，如何作為一個災難新聞研究議題，是另一值得關注的面向；第三，新聞記者如何成就一個成功的災難新聞報導，尚涉及到不同的因素，諸如記

者與消息來源和同業之間的網絡關係、記者的社會資本會如何影響災難新聞，未來可進一步探究；第四，記者的安全維護研究，未來也可以多加參考既有的公共衛生管理和醫療管理等研究領域，透過跨學科的接引，累積更多元和豐沛的知識；最後是經驗資料蒐集的問題，本研究在理論層次上強調由下而上的災難知識建構，也就是透過捕捉行動者在情境中發生的結果以及主觀經驗，藉此歸納分析箇中的意義和建立經驗知識。這仰賴持續蒐集和了解災難新聞工作者持續不斷的反思和行動方案的建立與修正，也意味著歷時的觀察和訪談等，是未來需要持續研究進行的方向。

謝辭

本文部分資料來自國科會（現為科技部）委託之數位典藏計畫「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兩年期）」（NSC 99-2631-H-004 -001），作者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許瓊文教授、研究助理簡旭伶、賴若函與田育志等人在研究進行期間所提供的協助與合作，受訪者無私的經驗分享，以及本刊審查委員對本研究提供的寶貴建議。

airiti 參考文獻

- 入江沙也可、正源和義、羅萍、戶田有紀、黃木紀之、武田弘克（2012）。《日本 311 的一堂課：會議內容完整實錄》。臺北市：公視基金會。
- 日本網（2012）。〈災區傳媒的戰鬥“讓災區訊息傳到東京，傳向世界（Part 1）”〉。2012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nippon.com/hk/views/b00701/>
- 朱元鴻（1995），〈風險知識與風險媒介的政治社會學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9: 195-224。
- 行政院勞委會（2005），〈新聞採訪人員安全衛生指引〉。<http://www.cla.gov.tw/site/business/41733649/420488d5/421ee68b/421ee82f/files/%B1%C4%B3X%AB%FC%A4%DE.doc>（檢索日期：2011 年 10 月 18 日）。
- 周桂田（1998a），〈現代性與風險社會〉。《台大社會學刊》21: 89-129。
- （1998b），〈「風險社會」中結構與行動的轉轍〉。《台大社會學刊》26: 97-150。
- （2003），〈獨大的科學理性與隱沒（默）的社會理性之「對話」：在地公眾、科學專家與國家的風險文化探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6: 1-63。
- 林照真（2009），〈電視媒體與災難管理－災難新聞的倫理困境〉。《廣播與電視》31: 55-79。
- （2013），〈臺灣電視新聞之災難報導：以「莫拉克」風災為例〉。《新聞學研究》115: 141-185。

- 胡光正（2007），〈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看貝克的「第二現代」〉。
《歐美研究》37(3)：445-484。
- （2010），〈風險社會下災變事件對於社會工作人力教育影響之初探〉。
《非營利組織管理學刊》8: 30-51。
- 孫曼蘋（2000），〈921 地震政府體系資訊傳布之初探〉。
《新聞學研究》62: 165-170。
- 徐淑惠、蘇崇豪（2011 年 12 月），《日本 311 震後理賠處理考察報告》。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 張文強（2002），〈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的權力、控制與反抗〉。
《新聞學研究》73: 29-61。
- 張宜君、林宗弘（2012），〈不平等的災難：921 地震下的受災風險與社會階層化〉。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2): 193-231。
- 張春炎（2013），〈東南亞的自然災難與他者化過程：2011 年泰國水患的媒體再現之初探研究〉，
《亞太研究論壇》59: 89-119。
- 張春炎、楊樺、葉欣誠（2015），〈自然災難與媒體建構：以 TVBS 新聞為例，重探八八風災新聞論述〉，
《環境教育研究》11(1): 1-30。
- 張苙雲（1992），〈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之間：剖析醫院醫療照顧的儀式性與迷思〉。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63-93。
- 許瓊文（2009），〈新聞記者採訪報導受害者應面對的新聞倫理：多元觀點的論證〉。
《新聞學研究》100: 1-55。
- （2011/03/16），〈我可以為您做什麼？赴日採訪的記者們〉。
http://traumanewswatch.blogspot.tw/2011/03/blog-post_16.html（檢索日期：2011 年 8 月 3 日）。
- （2011/03/17），〈媒體在災難中的正面功能（一）：從日本 NHK 災難期間應變談起〉。
<http://traumanewswatch.blogspot.tw/2011/03/nhk.html>（檢索日期：2011 年 8 月 3 日）。

——（2011/03/21），〈媒體在災難中的正面功能（二）：「我可以拍他們哭嗎」？〉。http://traumanewswatch.blogspot.tw/2011/03/blog-post_21.html（檢索日期：2011年8月3日）。

陳憶寧（2003），〈當天然災難可能成為政治災難：策略框架效果再探〉。《中華傳播學刊》3: 3-35。

黃厚銘（1997），〈知識份子、社會學家、與反身性〉。《台大學社會學刊》27: 43-70。

——（2002），〈皮耶·布赫迪厄與反身社會學〉。《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22。<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2/22-02.htm>（檢索日期：2011年5月10日）。

鄒川雄（2004），〈從現代社會的反身性論當代基督宗教的靈恩現象〉。《世界宗教學刊》4: 43-72。

臧國仁、鍾蔚文（2000），〈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相關研究簡述〉。《新聞學研究》62: 143-151。

劉昌德（2007a），〈媒體倫理的政治經濟學：國家、資本、與新聞專業規範的流變〉。《中華傳播學刊》11: 111-153。

——（2007b），〈民主參與式的共管自律：新聞自律機制之回顧與再思考〉。《臺灣民主季刊》4(1): 109-139。

——（2008），〈大媒體，小記者：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新聞學研究》95: 239-268。

衛星公會（2009），〈新聞自律執行綱要〉。《衛星同業公會官網》。http://www.stba.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9&Itemid=68（檢索日期：2011年8月10日）。

羅彥傑、劉嘉薇、葉長城（2010），〈組織控制與新聞專業自主的互動：以臺灣報紙國際新聞編譯為例〉。《新聞學研究》102: 113-149。

臺灣新聞記者協會（2004），《臺灣新聞記者權益手冊》。未出版資料。

蘇蘅 (2000)，〈集集大地震中媒體危機處理的總體檢〉。《新聞學研究》62: 153-163。

Beck, Ulrich, 汪浩譯 (2003)，《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台北：巨流。

Denney, David, 呂亦欣、鄭珮嵐譯 (2009)，《面對風險社會》 (*Risk and society*)。台北：偉伯文化。

Giddens, Anthony, 李康、李猛譯 (2007)，《社會的構成》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台北：左岸。

Gray, Ann, 許夢芸譯 (2008)，《文化研究：民族誌方法與生活文化》 (*Research practice for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lived culture*)。台北：韋伯。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2011). 〈採訪自然災禍 - 地震〉。
<http://asiapacific.ifj.org/assets/docs/178/118/58efeb2-77c2a76.pdf>
(Retrieved: July 5, 2011)。

Tuchman, G., 麻爭旗等譯 (2008)。《做新聞》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北京：華夏出版社。

Ahva, Laura (2013). Public Journalism and Professional Reflexivity.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14 (6): 790–806.

Aldridge, Meryl and Julia Evetts (2003).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Journ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4): 547–564.

BBC (2009). Journalism Safety Guide. www.bbc.co.uk/safety (Retrieved: January 20, 2012).

—— (2013/04/23). JSG Generic Risk Assessments — Disaster Coverage. <http://www.bbc.co.uk/safety/resources/aztopics/disaster-coverage.html>

(Retrieved: January 22, 2016).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1994).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edited by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55.

Bennett, Roger and Martin Daniel (2002). Media Reporting of Third World disasters: The Journalist's Perspectiv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11(1): 33-42.

Bennett, Cameron, Brent Edwards, Michael Field, David Robie, Alan Samson and Jon Stephenson (2010). Journalists at Risk: News Media Perspectives.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16 (1): 49-67.

Bentley, Gareth (2013). *Journalistic Agency and the Subjective Turn in British Foreign Correspondent Discour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erkowitz, Dan (1992). Routine News work and the What-a-Story: A Cas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6(1): 45-60.

Birkhead, Douglas (1986). News Media Ethics and the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Exploring Questions of Media Morality* 1(2): 37-46.

Bourdieu, Pierer and LOÏ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uchanan, Marla and Patrice Keats (2011). Coping with Traumatic Stress in Journalism: A critical Ethnographic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 Psychology* 46(2): 127-135.
- Cottle, Simon (2003). *Media Organisation and Production: Mapping the Field*. In *Media Organisation and Production* edited by Simon Cottle. London: Sage, pp. 3-24.
- (2009). *Global Crisis Reporting: Journalism in the Global Age*.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reswell, John (200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Dickinson, R. (2007). Accomplishing Journalism: Towards a Revived Sociology of a Media Occupation. *Cultural Sociology* 1(2): 189–208.
- Duhe', Sonya Forte (2008). Communicating Katrina: A Resilient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6(2): 112-127.
- Emirbayer, Mustafa and Ann Mische (1998). What is Agen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4): 962-1023.
- Ewart, J. (2002). Prudence not Prurience: A Framework for Journalistic Reporting Disasters. Paper presented at ANZCA Conference, Coolangatta Qld.
- Fuchs, Stephan (2001). Beyond Agency. *Sociological Theory* 19(1): 24 -40.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1).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nsen, Anders (1991). The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3: 443-458.
- International News Safety Institute (2006). *Killing the Messenger: Report*

- Of the Global Inquiry*. Belgium: International News Safety Institute.
- Lupton, Deborah (1999). *Risk*. New York: Routledge.
- Machin, David, and Sarah Niblock (2006). *News Prod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Niblock, Sarah (2007). From “Knowing How” to “Being Able” : Negotiating the Meanings of Reflective Practice and Reflexiv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Practice* 1(1): 20-32.
- Quarantelli, Enrico (1996). Local mass media operations in disasters in the USA.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5(5): 5-10.
- (2002). *The Role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Natural and Technological Disasters and Possible Extrapolation to Terrorism Situations*.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5). *Safety Guide for Journalists: A Handbook for Reporters in High-Risk*. New York: UNESCO.
- Richards, Ian (2007). Disaster News, Trust and Ethics. In *Media and Ethic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peeches and Final Report*, edited by Gazi Üniversitesi and İletişim Fakültesi. Ankara, Turkey: Gazi Üniversitesi İletişim Fakültesi Basımevi, pp. 145-152.
- Ryfe, David Michael (2006). The Nature of News Rul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3(2): 203-214.
- Saul, Ben (2009).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Journalists in Armed Conflict and Other Violent Situations.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9(110): 1-31.
- Schirato, Tony and Jen Webb (2003). Bourdieu’s Concept of Reflexivity as Metaliteracy. *Cultural Studies* 17(3-4): 539-553.

Schultz, Ida (2007). 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 *Journalism Practice* 1(2): 190 - 207.

Sorribes, Carles Pont and Sergi Rovira (2011).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risk and crisis situations: Significant examples from Spain. *Journalism* 12(8): 1052-1066.

Sykes, Jolyon and Kerry Green (2003). The Dangers of Dealing with Journalis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Brisbane, Australia.

Tait, Richard (2007). Practice Review: Journalism Safety. *Journalism Practice* 1(3): 435-445.

Tuchman, Gaye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4): 660-679.

—— (1973).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Tulloch, John and Deborah Lupton (2001). Risk, the Mass Media and Personal Biography: Revisiting Beck's 'Knowledge, Media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4(1): 5-28.

UNESCO (2016/10/7). The Safety of Journalists and the Danger of Impunity.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IPDC/ipdc_council_30_4_en_02.pdf (Retrieved: February 1, 2017).

Usher, Nikki (2009). Recovery from Disaster: How Journalists at the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Understand the Role of a Post-Katrina Newspaper. *Journalism Practice* 3(2): 216-232.

Wenger, Dennis and Barbara Friedman (1986). Local and national media

coverage of disaster: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print media's treatment of disaster myt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4: 27-50.

Wimmer, Jeffery and Thorsten Quandt (2006). Living in the risk society: An Interview with Ulrich Beck. *Journalism Studies* 7(2): 336-347.

Wood, Martin (1998). Agency and Organization: Toward a Cyborg-Consciousness. *Human Relations* 51: 1209-1227.

日本放送協會 (2011), 《NHK 放送ガイドライン 2011》。http://www.nhk.or.jp/pr/keiei/bc-guideline/pdf/guideline2011.pdf (檢 索 日 期 : 2011 年 10 月 3 日)

日本記者壓力研究會 (2011/03/21)。〈災害などにおける取材・報道マニュアル〉(採訪日本地震注意指南)。http://dartcenter.org/global/%E6%83%A8%E4%BA%8B%E3%82%B9%E3%83%88%E3%83%AC%E3%82%B9%E3%83%9E%E3%83%8B%E3%83%A5%E3%82%A2%E3%83%AB#.Uc0KmF8VFLM(Retrieved: January 22,2012).

—— (2011/03/21) 〈災害などで取材や報道にあたる際のセルフケアについて〉(て對災害等情況的採訪報導守則)。http://dartcenter.org/global/%E4%BB%8A%E5%9B%9E%E3%81%AE%E5%9C%B0%E9%9C%87%E7%81%BD%E5%AE%B3%E3%81%A7%E5%8F%96%E6%9D%90%E3%82%84%E5%A0%B1%E9%81%93%E3%81%AB%E3%81%82%E3%81%9F%E3%81%A3%E3%81%9F%E3%82%B8%E3%83%A3%E3%83%BC%E3%83%8A%E3%83%AA%E3%82%B9%E3%83%88%E3%81%AE%E7%9A%86%E6%A7%98#.Uc0LH18VFLM (Retrieved: January 20, 2012).

松岡東香、木下知己 (2012), 〈つくばイノベーション研究の展開と: 東日本大震災復興への提案〉。《筑波学院大学紀要》7: 77-84。

附件一：災難新聞報導反身性經驗之問題大綱

一、剛得知有災難發生

1. 接到公司長官通知，希望您前往災區採訪，您當時怎麼回應？有什麼是你當下會考慮的嗎？

二、接受災難採訪任務

2. 已經確定要前往災區採訪了，你當時作些什麼準備？跟公司確定哪些事項？
3. 要前往災區採訪前，您怎麼跟家人或另一半溝通？

三、抵達災難現場

4. 您怎麼跟公司聯繫合作？多久跟公司聯繫？聯繫時應該固定讓公司知道哪些事情？
5. 採訪時，您如何判斷什麼區域可以進入、什麼區域不可以？
6. 採訪時，你曾考慮哪些安全事項，避免發生危險？
7. 在採訪的時候，您有沒有想過，應該怎麼幫助採訪搭檔，避免他受傷？
8. 採訪的時候，您若受傷了應該怎麼辦？伙伴受傷了又怎麼幫助他（她）？當時您會注意哪些事項？
9. 採訪過程中覺得壓力很大，你怎麼處理？

四、要開始訪問了，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

10. 在災難現場，您是優先訪問哪一類受訪對象？
11. 訪問災民時，有注意哪些事項嗎？

- airiti
12. 採訪時，遇到災民拒絕受訪、甚至抗議的情況嗎？這時候你是怎麼處理的？
 13. 在官方記者會進行採訪，需要注意什麼？
 14. 在國外災區進行報導，有哪些特殊因素是您碰到的？檢視那段經驗，您覺得應該怎麼注意？

五、進行報導時，有哪些方式需要特別注意？

15. 進行災難報導的時候，您用了哪些報導方法？經歷過後，您覺得還有什麼樣的手法可以採用？
16. 報導的時候，您覺得應該避免用什麼報導手法？

六、採訪完畢後

17. 完成採訪了，您回到家是否有睡不著、忘不掉災區畫面等狀況？您是如何處理的？
18. 檢視您所完成的採訪，您覺得還需要注意哪些事項，確保自己並未因這次採訪而有負面影響？
19. 您自我檢視 311 的採訪經驗後，覺得還有什麼可以注意的，來幫助未來災難新聞報導的專業發展？